

元代大都城南花卉文化的兴起

吴文涛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历史所, 北京 100101)

[摘要] 北京丰台花卉文化的源头可以上溯到金、元时期，元代是其蓬勃兴起的重要阶段。在国家统一和城市建设的影响下，大都城南地区别墅众多、文人雅集，带动了花卉种植业的兴起与赏花风尚的形成；永定河主河道的移出，为花卉种植提供了水脉、土壤以及交通等适宜的自然条件。社会变动与环境变迁，共同促进了北京城南部这一特色地域文化的发展。

[关键词] 元代；大都城；花卉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054 (2010) 02-0092-06

花卉种植和经营是北京丰台区花乡一带的传统产业，素有“丰台芍药甲天下”、“草桥十里百花妍”的盛名，历代文人为之留下了丰富生动的赞誉诗篇，京城百姓也有春季到城南郊区赏花的习俗，从元代历明、清延续至今，由此形成了极富地域特色和历史传承性的丰台花卉文化。作为北京区域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正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然而，除了部分花卉专家和民俗学者的实地调查和简略介绍外，史学界对此研究寥寥无几。本文依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对丰台花卉业在元代前后产生、发展的过程及其历史背景、环境因素等进行学术考察，以期为深化北京地方史的研究、为打造丰台地方文化品牌提供史实依据和理论基础。文中所谓“元大都城南”，泛指今丰台区草桥、黄土岗、丰台镇等地以及相邻的宣武区部分地域。所引文献中“城南”、“丰宜门（金中都城正南门）外”等地域指代，也多对应元大都城南、金中都旧城及其西南郊外等，其地大多在今丰台区境内或与宣武交界区域。

一、大都城南花卉业的发展历程

1. 城南种花养花的历史溯源

以丰台、草桥、黄土岗等地为代表的城南一带把种植、销售鲜花作为一种生产经营行业的历

史，大致可以追溯到金代。《大金国志》记载，天德二年（1150）七月，海陵王完颜亮对右丞相梁汉臣说：“朕栽莲二百本而俱死，何也？”梁回答：这是由地理环境造成的，“上都地寒，惟燕京地暖，可栽莲”，从而引发了君臣之间关于迁都到燕京的讨论^[1]。由此可知，燕京即后来的金中都城周围，具有适合种花的气候、土壤和水源条件。金迁都燕京后就在城西郊的西湖广植莲花，西湖遂易名为“莲花池”，这就是今北京西站莲花池的前身。目前掌握的史料显示，最早确切记载金、元时期丰台境内种花情形的文献，是生于金朝末年的元初政治家、大学者王恽的诗文。

王恽（1227～1304），字仲谋，号秋涧，他在《秋涧集》卷十《花工王氏歌》里，专门记述了城南花匠王珪的故事：“城南刘郎携斗酒，与客来参秋涧叟。当隅蹶缩不敢坐，王姓珪名三十九。平生有技真可人，好个春风接花手。木翁夺秀孕黄婆，转眼红朋栖碧友。刘郎秀春趣已成，往往豪家斗招诱。王生本出方技家，品味神经无不有。流芳转入百花香，岂此橐驼法堪取。只今家住园田西，小桥流水遮高柳。会邀一醉百花堂，要藉我书传不朽。我自东归今五年，小园栽种期幽妍。城中粪壤杂瓦砾，虽有美植何由蕃。结根失所固可惜，异品奚独冰霜缠。君不见

[收稿日期] 2009-11-01

[作者简介] 吴文涛（1966-），女，上海市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芳兰种不生恶草，剪不去此事人间。自今古门园子听予语，本根或拔非所宜，一接千金戒轻与。”^[2]诗中提到，时年39岁的王珪做花匠，是传承了祖上或师傅几代人的高超技艺，所培育的花卉不论在种类还是品质方面都达到接近完美的程度。如果明确了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即可推出花匠王珪及其师傅或祖上生活的时代，进而得到有关丰台养花起始时间的粗略判断。《花工王氏歌》中有“我自东归今五年”之句，而在作者的同一卷诗中，此诗之前的《中秋吟》称“二年中秋客滦阳”，其小序又说“中统二年，予客上都，馆于太医使王宜之家中”。上都是元朝在蒙古时代的都城，营建大都城之后变为陪都，地处滦河（闪电河）北岸，因此又有“滦阳”之称，其遗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五一牧场。王恽在蒙古中统二年（1261）客居上都，住在太医使王宜之家中。在元大都尚未建成的时候，所谓“东归”就是从西边的上都来到东边的燕京（亦即“中都”，金中都旧城），而“我自东归今五年”当在至元三年（1266）。花匠王珪就是这一年由城南（金中都旧城之南，当时元大都尚未建成）刘郎引荐给王恽的。由此上溯，王珪的师傅或祖上应是金代中后期的人。如果没有他们的熏陶和教导，王珪也不会成为一个技艺高超的花匠。这个传承过程表明，有确凿无疑的文献为依据的城南花卉种植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金代。

2. 元代城南花卉种植业的兴起及赏花风尚的形成

进入元代以后，有关大都城南花卉种植及赏花习俗的文献记载和诗文就比较丰富了，最典型的亦属前文提及的王恽的诗文。至元三年（1266），王珪在金中都旧城以南的刘郎带领下，到城里拜见王恽，希望王恽到他的花园里饮酒并留下诗文。王恽参观后在《花工王氏歌》中赞颂道：“平生有技真可人，好个春风接花手。木翁夺秀孕黄婆，转眼红朋栖碧友。刘郎秀春趣已成，往往豪家斗招诱。”寥寥数语反映出丰富的历史信息：第一，花匠王珪本领高超：善于嫁接，能像春风一样催动百花盛开；第二，王珪供职的花园美丽神奇，各色花卉争奇斗艳，令人称羡，常常有豪门大族想方设法把王珪招引到他们

那里，由此可见开辟私家花园已经十分普遍，而且争相攀比谁家的花卉更出色。诗中其它几句则进一步反映如下情形：一些技艺高超的花匠（如王珪），可以和士大夫交往，他们的栽培技艺与名贵的花卉品种受到文人与贵族的追捧并广为传播，证明花卉种植与观赏在社会生活中已经处于比较重要的位置。王恽的这首叙事诗，为元代种花业的发展水平留下了宝贵的记录，也由此让人知道元代种花赏花风气的流行。

王恽的《远风台记》则更多地反映了士大夫们游园赏花的活动。远风台的主人是元朝初期的御史韩通甫、韩君美兄弟，又称“韩御史别墅”，位于今玉泉营附近。《远风台记》写于至元十五年（1278）四月，文中记载：“丰宜门外西南行四五里，有乡曰宜迁。地偏而僻远，土腴而气淑。郊丘带乎左，横冈亘其前。中得井地三九之一，卜筑耕稼，植花木，凿池沼，覆蕡池傍，架屋台上，隶其榜曰远风，以为岁时宾客宴游之所者，韩氏之昆仲也。……少顷，风翛翛然自太虚中来，浸淫乎蹊谷，荡漾乎林野。春和明霁，微埃不兴。声先乎群木之颠，气郁乎崇丘之外。然后度丛桂，入亭圃，转兰蕙蕙，泛溢乎层栋轩楹之间。座客欣然，动兰台之兴，畅方外之适，披襟当之曰：‘信乎！涤烦臆，抒滞思，而其来之之远也。’……”^[3]值得注意的是，韩氏兄弟在这里“卜筑耕稼，植花木，凿池沼，覆蕡池傍，架屋台上”，修筑了赏花观景的“远风台”，作为四季宾客聚会游览的场所。园中具有代表性的景观是桂树和兰花，每当清风徐来，桂花的香气和兰花的芬芳随轻风穿越厅堂流转檐下，让座上宾客顿觉清爽怡人，不禁由衷赞叹。远风台的景色和留给人们的感觉如此美好，所以它在元初士大夫中影响很大，是一批志趣相投的士大夫在大都城外游乐聚会的重要场所，并因“地以人传”的效应成为远近闻名的观景胜地与突出的地理标志，今人对“丰台”之名起源的考证也往往与它联系起来。

透过花匠王珪的经历与韩氏兄弟远风台的景观，可以看到元代大都城南种花已达到较高水平，士大夫养花赏花也成为一种时尚。元代欧阳玄在描写九月大都城的一首《渔家傲》词中，有“一本黄花金十镪，富家菊谱签银榜”之

句^[4]，大意是一株菊花价钱高达十两银子，富贵之家纷纷在花厂预定，彼此之间就像以菊花斗富一样。这就进一步说明，花卉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已经占有一席之地。此外，元末熊梦祥《析津志》等文献显示，逢春时节大都城居民携妇将雏、呼朋唤友地前往城南（即金中都旧城）一带“踏青斗草”，如同到海子（今什刹海一带）周边游春一样，是每年大都城“游赏之盛事也”^[5]。

元大都人宋褧还给我们提供了时人赏花的具体例证。宋褧（1292~1344），字显夫，曾任翰林直学士、监察御史。他在《燕石集》中记载了寒食节到丰台观花的一段经历：

一百五日，侍诚夫兄出南城拜扫沙岱先塋归。循宜泉桥北少东，一园内有金太祖武元皇帝碑，扃守严秘。呼主人开门，读竟，憩园后小亭。亭四旁植卉木，成列甚多，峙二灵壁石于巽坤隅。……已而要坐外阁，茵榻帘几，事事皆清。致以浙瓯供茗，令人洒然。少顷风作，命仆就恩折花。主人送出，且以辛夷花诧献。上马转至园后，适李花盛开，斥驺者逾墙窃致之，遂归。……主人周姓，亦颇知好客云^[6]。

这段文字中的几处细节，特别值得注意：一是亭子四周种的花卉树木，成行成列，茂盛可观；二是宋褧等人被请到园外的阁楼里休息，里面的陈设和装饰清雅可人，而且主人用浙江产的杯子请客人喝茶，令他们感到特别快意。三是宋褧醉心于园中的鲜花，求折几枝，主人竟奉上了芬芳四溢的辛夷花（玉兰）。从中可以判读出以下信息：这是丰宜门外的一处私家花园，主人是汉族（周姓），且从其陈设和待客方式看很可能来自南方江浙一带；园中有金代文物，很可能就是某处金代花园的遗址；花木繁盛，景色宜人，玉兰和李花是其特色。其中，被称为“辛夷花”的玉兰是来自南方的珍贵花种，所以让不请自来的客人倍感惊喜。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文人士大夫们对于到城南一带郊游的热衷以及私家园林的普遍，可以看到园中花卉培植的兴盛以及南方园林文化的影响。

今人李紫宸在北京经营鲜花店五十多年，他在回顾本行业历史时写道：“北京的花木业，

在元时就有个雏形了。那时，由于大批的茶叶从南方运来，一些商贩便专门向茶叶铺卖茉莉、玉兰、含笑等熏茶叶的花，这样就逐渐形成一个专营鲜花的行业。”^[7]本行业人士口传心授的历史，与古代文献记载的赏花养花资料互相对照，从不同角度说明：元代时花卉种植得到了进一步推广，在城南一带已作为一种行业而广泛兴起；赏花游春的社会风尚表明，这里养花种花的普及包含了一种文化意味，反映了当时大都城社会生活及文化发展的一个侧面。这种传统延续到明清时期，丰台、草桥一带的鲜花大量供应京城，不论在品种还是技术上都迎来了它在古代社会的极盛时期。城南地区独特的园艺技术及其在花匠之间的传承，鲜花的销售方式及其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与园林花卉相关的文人雅事，历代赞美丰台草桥一带美景的诗文，独特的民间花会组织、独有的民间花神信仰及其主要活动，关于今丰台地区花卉的演义传说等，经过岁月的洗礼已经融合为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传统，而这种文化传统的奠基阶段就在元代。

二、大都城南花卉文化兴起的社会背景

元朝大都城南一带花卉种植行业的兴起以及养花赏花风气的形成，与其城市建设及文化发展密不可分。

1. 元朝的统一和大都城的繁荣发展

元朝灭金以后，仍以金中都所在地燕京为都城，随后又改名为大都。但是，战火摧毁后的金中都已残破不堪，原来供应金中都城的莲花池水系也远不足以解决大都的水源问题。因此，元朝没有在旧城址上重建，而是选择了金中都东北郊十几里外一片水域的南端，也就是现在的北海和中海附近修建新的皇城宫殿，以此为中心另建了一个大都城。金中都的废弃和元大都的北移，不仅留下了一片空旷的废城址，也留下了昔日宫殿苑囿的繁华余韵、市井生活的文化气息。许多官宦、文人尤其是南方过来的汉人在此兴建私邸花园，举行各种宴请游乐活动。私家园林的发展，带动了城南一带的花卉培育种植。随着元朝南北统一进程的展开和政权的逐步稳定，大都城日益繁荣发展。尤其是南北大运河的开通，不仅带来了元大都物质生活的丰富，更促进了南北文化的

交融。仅就园林和花卉而言，运河不仅运来了南方的花种，也带来了南方的花培技艺和园林文化。

2. 别墅林立与文人雅集

城南一带在历史时期曾经林深草密、流泉遍地，自古以来多亭台楼阁，是人们游春赏景、休闲观光之所。文献记载，辽金时就有多座宫廷苑囿坐落在这里，如金中都的莲花池、琼林苑、葆台（传说金章宗李妃梳妆台所在，遗址在今大葆台附近）及熙春园等。进入元代以后，许多达官贵戚纷纷在今花乡、草桥一带修建园亭别墅。明朝《帝京景物略》称：“草桥去丰台十里，中多亭馆，亭馆多于水频圃中。而元希宪之万柳堂（按：实为廉园），赵参谋之匏瓜亭，栗院使之玩芳亭，要在弥望间，无址无基，莫名其妙。”^[8]清朝的《天府广记》也说：“今右安门外西南，泉源涌出为草桥河，接连丰台，为京师养花之所。元人廉左丞之万柳园，赵参谋之匏瓜亭，栗院使之玩芳亭，张九思之遂初堂皆在于此。”^[9]尽管这两条史料均为明清时人所记，其中个别园林的定位也有误，但对当时园林盛景的反映基本属实。

所述元代的几处私家园林中，比较有名的有：赵禹卿建的匏瓜亭，大致在今丰台区方庄体育公园附近。有关其景色，王恽著《匏瓜亭诗》中记载：“君家匏瓜尽鳞彝，金玉虽良适用齐。为报主人多酿酒，葫芦从此大家提。”又“筑台连野色，架木系匏瓜。舍外开三径，壶中自一家。爱吟歌白虹，酾酒脱乌纱。更喜南窗下，秋风菊半华。”^[10]可见匏瓜亭以乡野情趣而著称。栗院使的别墅玩芳亭，在今丰台区右安门外。王士熙有诗：“每忆城南路（可见该园是在城南，与所指草桥一带相符），曾来好画亭。兰花经雨白，野竹入云青。波影浮春砌，山光扑画扇。褰衣对蘿薜，凉月照人醒。”^[11]说的就是对玩芳亭的印象和感受。《析津志辑佚》引徐氏铸学斋抄本《析津志》的评价则是：“一时文彦品题甚富”，足以印证了当时文人们对它的喜爱。此外，还有遂初堂、野亭等。据《帝京景物略》记，遂初堂“以花竹水石之胜甲于京城”。野亭又称符氏雅集亭、酒亭、南野亭，位于卢沟桥附近，元朝大文人虞集著有《南野亭诗》，描绘了

其如诗如画的景色^[12]。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廉希宪的廉园。廉希宪（1231 ~ 1280），一名忻都，字善甫，号野云，是元初的功勋要臣，元世祖时曾官至中书平章政事。廉园的位置在今丰台草桥附近，在文献中常被混同于廉氏在今钓鱼台附近的另一处别墅——万柳堂。廉园除了水清木华的景色外，最具特色的是以牡丹为代表的名贵花卉。元代的袁桷在《清容居士集》中，以“廉右丞园号为京城第一，名花几万本”为题，写诗记录了廉园景色：“闭户春深诗祟侵，卷帘新燕掠清阴。亭亭梅月能消酒，肃肃松风独和琴。新笋未容穿石径，落花时许补云林。主人妙手随机转，万木姚黄磨紫金。”他还因为“禊日与刚中待制至廉园，闭门不内，驻马久之”，写下了“花飞竹外疑红袖，水度松间自玉琴”的诗句^[13]。这些作品为后人留下了有关廉园的广阔想象空间。至于廉园名花如何号称“京城第一”，《元朝名臣事略》所记可以为证：“时营缮东宫，工部官请曰：牡丹名品惟相公（廉希宪）家，乞移植数本，太子知出公家矣。王曰：若出特命，园虽先业，一无所斲。我早事圣主，备位宰相，未尝曲丐恩幸。方尔病退，顾以花求媚邪？请者愧止”^[14]。廉园花卉之盛，不仅被太子垂涎，而且影响了附近村庄的命名，今右安门外东南的花园村即由此而来。

大都城外西南郊的这些私家园林，大多拥有自己的特色花卉，如远风台的兰、桂，万柳堂的柳、荷，廉园的牡丹，匏瓜亭的葫芦，玩芳亭的兰、竹等。园主视在园中种花植树为雅好，以各自得意的品种和景观相互攀比，士绅文人之间彼此串游、赏鉴，是当时士大夫中的一种风尚，从而引导了城南一带花卉种植业的蓬勃发展。形似江南的庭园美景和争奇斗艳的名贵花木，吸引着文人士大夫来此举行宴会和歌赋吟唱等活动，此即所谓文人雅集。《远风台记》中所反映的是元监察御史韩通甫、韩君美兄弟邀请王恽等人郊外游乐、登台观景之事；《南村辍耕录》中有关万柳堂的记载^[15]，也是因廉希宪邀请赵孟頫等而引起；有关廉园、匏瓜亭、玩芳亭等的描述，更是来自于许有壬、袁桷、王恽、虞集等人拜访、游园之后的即兴诗作。上述人物大多是汉族知识分子乃至汉儒名士；廉希宪虽为畏兀儿人，但素

来敬重儒学，有“廉孟子”之称，也应算作汉化派代表。他们在这一带兴建园林别墅，郊游聚会，客观上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大都城内的特殊文化氛围，那就是浓郁的汉文化气息。

三、大都城南花卉文化兴起的环境因素

1. 永定河主河道的移出

永定河是北京的五大水系（永定河、北运河、潮白河、拒马河、蓟运河）之一。远古时期的永定河，穿过晋北高原、太行山脉的崇山峻岭往东南流，过门头沟三家店以及卢沟桥所在地以后，便伴随着季节性水量的增减，在广阔平坦的华北平原随意地摆动、宣泄，形成了大片的洪积冲积扇，既造就了肥沃的土壤，又留下了多条河道和大量湖沼，以及丰富的地下水，哺育了北京地区最初的文明和后来北京城的成长与壮大。据尹钩科、段天顺等考证，古永定河出西山后，在今北起清河、南到黄村的范围里，曾经从北到南地留下了四条永定河的古河道：古清河、古金钩河、灤水故道及古无定河^[15]。历史上的永定河曾漫流于看丹、草桥、马家堡一线至南苑、大兴之间，即北魏郦道元所谓的灤水故道上。如今丰台所辖的河东地区大部分都在永定河的灤水故道的北岸，从马场到草桥以及花乡一带地表的沙土、沙丘以及地底下的河滩石、鹅卵石都证明了这一点。元朝以后，由于水文状况的改变及筑堤等因素，永定河水不再直接向东流经北京城南的灤水故道，其主流开始逐渐向西向南摆动，最终自石景山南大荒进入今丰台区，经东沿河、刘庄子、卢沟桥后，再往南由北天堂流入今大兴区，形成现在的河道。正是由于主河道的移出，给当地的花卉种植留下了丰富的水体、开阔的空间和适宜的沙土条件。

2. 泉流广布的自然环境

永定河的长期流经与频频改道，使丰台自看丹往东，经草桥、马家堡至南苑一带的地下含水层极其丰富，遇地势低洼处，便涌出地面，形成

溪流，汇集成湖泊。今丰台境内有水头庄、百泉溪、万泉寺、丽泽门（关）等地名，都集中在草桥以西一带。《大明一统志》记载：“百泉溪在（顺天）府西南十里，丽泽关平地有泉十余穴，汇而成溪，东南流入柳村河。”^[16]《大明一统志》虽是明朝人所编，但对此处地理环境的反映也应是元朝状况的一种基本沿袭，变化不会很大。正是因为这里地势低洼，泉流众多，附近的道路常常泥泞不堪，很不便于行走。元朝人宋褧《寒食拜扫盘桓南城亲友家书所闻见俚歌十首》之一，就有“柳村南路百泉涌，陷车蹶马沮洳深”这样的描述^[17]。

丰台花卉业的中心草桥附近，历史上长期溪流淙淙。《帝京景物略》记载：“右安门外南十里草桥，方十里，皆泉也。会桥下，伏流十里，道玉河以出，四十里达于潞。故李唐万福寺，寺废而桥存，泉不减而荷荷盛。……土以泉，故宜花，居人遂花为业。都人卖花担，每辰千百，散人都门。……草桥去丰台十里，中多亭馆，亭馆多于水频圃中。”^[18]南苑附近，也是湖泊成群、水草丰美的地方。这一带有元朝的下马飞放泊，广四十顷，每年“冬春之交，天子亲幸近郊，纵鹰隼搏击，以为游豫之度，谓之飞放”^[19]。右安门外和永定门外之间，也曾是有很多莲池水田的低洼沮洳之地，很多南方来的人会有“依稀似故乡”的感觉。他们之所以选择在这里落户安家，营造江南水乡似的庭园，除了有交通之便（城南是通往南方的必经之地），更有情感上的亲近。

总之，北京丰台的花卉种植业具有悠久的历史，它发源于金朝，兴起于元大都城南一带，伴随着当地私家园林的兴盛而兴盛，与当时大都城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以及永定河等地理环境的变迁有着密切关系。大都城南一带园林花卉业的兴盛，反映了大都市民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的生活状况，同时也体现了多元文化的相互交融。

注释：

- [1] [南宋] 宇文懋昭. 大金国志：卷十三·海陵炀王上 [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 [元] 王恽. 花工王氏歌. 秋涧集：卷十. 《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M]. 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 [3] [元] 王恽. 秋涧集：卷四十·远风台记 [C].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 [4] [元] 欧阳玄. 圭斋集 [M]. 民国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 [5] [元] 熊梦祥. 析津志. 析津志辑佚本 [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 [6] [元] 宋斐. 燕石集：卷六·沙岱拜扫. 《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7] 李紫宸. 北京的花木业 [A]. 文史资料选编：28辑 [C].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
- [8] [明] 刘侗, 于奕正. 帝京景物略：卷三·草桥 [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
- [9] [清] 孙承泽. 天府广记：卷三十七·名迹 [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
- [10] [清] 吴长元. 寅垣识略：卷十二·郊烟一 [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
- [11] [明] 蒋一葵. 长安客话. 卷三·万柳堂 [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
- [12] [元] 袁桷. 清容居士集：卷十. 国家图书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M]. 北京：商务印书馆影印，2005.
- [13] [元] 苏天爵. 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 国家图书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M]. 北京：商务印书馆影印，2005.
- [14] [元] 陶宗仪. 南村辍耕录：卷九·万柳堂 [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5] 尹钩科, 吴文涛. 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第三章 [M].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
- [16] [明] 李贤等. 大明一统志：卷一·顺天府 [M]. 三秦出版社影印明天顺原刻本，1990.
- [17] [元] 宋斐. 燕石集：卷九. 《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M]. 北京：商务印书馆影印，2005.
- [18] [明] 宋濂等. 元史：卷四十九·兵志四 [M]. 北京：中华书局，1997.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and Environment of the Rise of Flower Culture in the South Area Beside Dadu City Since Yuan Dynasty

WU Wen-tao

(History Department,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flowers in Fengtai, a southern district of Beijing now, started since Jin and Yuan dynasty. Especially, the culture of planting flowers sprang up in Yuan dynasty. In the wake of the state unity and construction in Dadu city, more and more noble class and intellectuals inhabited in the south area beside Dadu city and built their villas and gardens there. So that cultivating flowers as a trade was prosperous and the custom of flower admiration developed. The changes of water environment in Yongding River basin brought some impact on this trend too.

Keywords: Yuan dynasty; South Area beside Dadu City; flower culture

(责任编辑：窦 坤)